严启航．乡村产业多元化进程中的“新农人”嵌入路径与功能定位［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4）：112-121.
Yan Qihang. Embedding empowering： the embedding path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new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4）：112-121.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4.011

乡村产业多元化进程中的“新农人”嵌入路径与功能定位

严启航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新农人”参与产业发展体现人力资本更新与乡村产业升级的双向互动。研究聚焦“新农人”这一推动乡村产业迭代的关键群体，基于对四川、浙江两地旅游示范村的田野调查，构建“嵌入—赋能”理论框架，系统阐释新农人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农人通过“认知性嵌入—身份性嵌入—策略性嵌入—服务性嵌入”的进阶路径，实现从外部参与者到内生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并在此过程中触发乡村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响应：一方面通过供给增能、市场拓展与资源优化等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借助组织功能变革重构产业发展生态，最终形成“外源赋能”与“内生发展”有机融合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研究为理解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建构与系统性变革提供理论参考，也对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政策创新具有实践启示。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新农人；进阶式嵌入；结构性赋能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4-0112-1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产业人才是乡村产业朝着多元化方向转型的关键所在，产业人才不足阻滞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虹吸效应增强，乡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人才问题日益突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加大对乡村产业的扶持力度，农村发展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要把乡村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在大力培养本土人才的同时要引导城市人才下乡，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乡村人才困境开始有扭转之势。“新农人”日益成为乡村产业发展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农人”问题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学界对新农人内涵的讨论形成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新农人主要是指秉持农业生产新理念，运用网络新思维，追求安全供给和农业价值目标的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而广义上的新农人则不仅包括运用新思维新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还包括为农业提供宣传、推广、指导和咨询等服务的人或群体[1]。前者只是强调农业领域的生产经营，无法对村庄产业多元化发展时期的多元主体进行概括，而后者则过于宽泛，无法精准识别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群体。基于此本文立足村庄产业多元化发展实践，将新农人视为在乡村产业多元化进程中，通过其行动与村庄发生互动，在乡村场域中发挥“新农人”功能的行为主体。

新农人的出现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方面国家政策为新农人进入乡村创造

收稿日期：2025-09-18 **修回日期：**2025-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县乡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3&ZD139）
作者简介：严启航，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

条件，国家全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了政策红利，提升返乡创业预期和信心[2]，同时国家直接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农村青年以及市场主体向农村回流[3]。另一方面村庄整体环境改善，在经济潜力增大的同时，人居环境也发生极大的变化，成为吸引“新村民”下乡的影响因素之一[3]。从个体因素来看，实现价值目标，以及个体对传统文明的亲和与对现代产业经营追求也构成了驱动新农人出现的主要因素[4-5]。外部环境和个体意愿的变化从不同层面对新农人的出现做出解释，但是新农人的出现是一个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除了个体动机和外部环境变化之外，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也是新农人产生的重要归因，其对“新农人”的规模、类别和质量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新农人作为一种新型主体，其融入乡村社会的状态与社会的互动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检视。王维、向德平从乡村社会发展的维度认为乡村人才经历一个从“脱嵌”到“再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主动利用地方政策、自身资源和多元关系网络实现制度性再嵌入、资源性再嵌入和关系性再嵌入[6]。孙小梅等人则呈现一个通过分类赋能和选择性吸纳促使乡村新型治理主体从脱嵌到重塑再到重嵌的转型[7]。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嵌入是一个由外部机制驱动的结果。新农人作为一个“再嵌入”或“新嵌入”主体，其嵌入状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有研究较少对其特殊性给予关注，而对其特殊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是如何在生计变迁中保持平衡，又是如何对产业多元化发展形成人才稳定供给的机制。

基于对新农人产生基础和与乡村社会互动特性了解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新农人产业实践是如何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实现耦合的。班涛从嵌入式能动角度认为返乡创业群体构成乡村振兴的中间实体，衔接城乡两端，促进城乡要素流动，降低向市场供给产品的成本[8]。李耀峰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以及小农户基于理性回应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关键[9]。赵雪等人认为新型主体通过产业链延伸和技术渗透参与产业融合，不仅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绩效，也推动乡村产业振兴[10]。除此之外实用型人才所掌握和具备的能力[11]，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互利共生”[12]等也对乡村产业发展做出解释。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新农人群体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但是新农人究竟是如何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其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实践的内在理路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去探讨。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笔者2024年4月与2024年7月，分别在四川、浙江两地选取的两个典型乡村旅游示范村所开展的田野调查。这两个村庄均由地方政府重点推动旅游发展，实现从普通村庄到区域亮点村的转型过程，且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普遍出现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为理解“新农人”与乡村产业多元化的关联提供合适的经验现场。在资料收集方面，本研究以半结构访谈为主，辅之以参与观察与文件资料收集。访谈对象共58人，主要包括村干部、返乡创业人员、外来投资的市场主体负责人以及本地种植大户等四类群体。访谈均由笔者及团队成员实地完成，每次访谈平均持续2至3小时，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谈话内容进行重点记录，形成文本资料约20万字。为便于引用与后续分析，访谈材料采用“省份首字母＋访谈日期＋受访者姓名首字母”的规则进行编码。正文中访谈内容的引用，均标注相应编码，并确保引用内容与论述观点直接对应。本研究访谈资料通过对比不同角色受访者叙述，并结合当地政策文本、在册资料等进行相互验证。全文引用的访谈内容均服务于“新农人如何嵌入并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的核心议题，重点关注“新农人”嵌入村庄的路径与在村庄产业多元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而非对某一村庄发展过程的全景式呈现。

二、“嵌入—赋能”：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嵌入性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构关系[13]，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深深“嵌入”在复杂的社会网络、制度结构与文化认知之中[14]，并作为关键因素调节着实践行为的取向与持续性[15]，嵌入不足则可能导致实践受阻[16]。从波兰尼揭示“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到格兰诺维特强调行为与社会

结构的“双向互构”并提出“关系—结构”二维分析框架[17-18]，再到后续学者拓展出“结构—认知—文化—政治”等多维视角[19]，该理论体系日趋完善，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将“嵌入性”理论应用于新农人研究，构建一个“嵌入—赋能”动态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旨在系统阐释新农人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的内在机理。该框架包含前后衔接、循环作用的双重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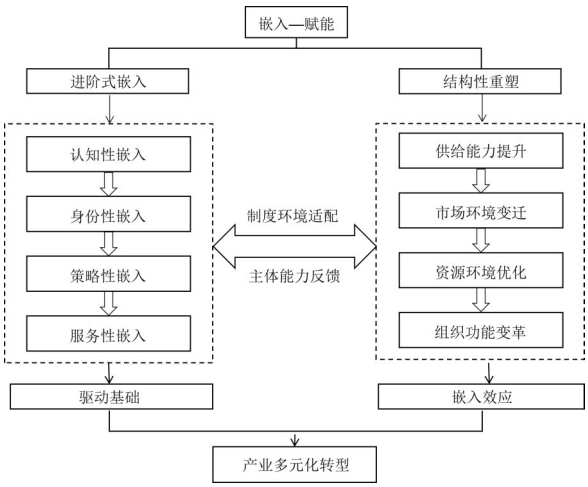


图 1 “嵌入—赋能”分析框架

其一为“进阶式嵌入逻辑”。进阶式嵌入刻画新农人主体角色深化的动态轨迹。新农人的嵌入并非单一维度的静态存在，而是一个从浅层认知到深度融入的序列演进。具体而言新农人首先通过认知性嵌入实现对乡村价值与发展潜能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借助身份性嵌入（如利用本地身份或政策身份）获取村庄社会的初步接纳与信任；进而通过策略性嵌入，将自身的技术、资本与商业模式融入本地产业生态；最终升华为服务型嵌入，即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承担更多社区责任的建设者，完成从“外来者”到“内生性行动者”的根本性角色转变。

其二为“结构性赋能逻辑”。“结构性赋能”是“进阶式嵌入”所引致的系统性效应与产出。新农人深度的、多维的嵌入行为，触发乡村产业系统的结构性重塑效应具体表为通过供给革新，引入新技术与新标准，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使乡村产业供给增能；通过市场延伸，对接更广阔的需求，重塑乡村产业的价值实现渠道，重塑乡村产业市场环境；通过资源重组，优化配置本地闲置要素并引入外部稀缺资源，激活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优化多元化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通过组织再造，创新利益联结与协同机制，提升产业应对风险的整体韧性。多重维度的协同作用，共同增强乡村多元化产业发展的韧性，并最终推动整个乡村产业体系从“传统封闭”向“开放创新”的结构性跃迁。

质言之，“进阶式嵌入”构成新农人赋能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结构性赋能”则是嵌入行为所催生的系统级成果和最终效应，二者共同构成新农人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区别于传统嵌入理论单向度解释路径，本框架凸显两大创新：一是提出“嵌入—赋能”的循环反馈机制，强调新农人在进阶式嵌入中获取资源赋权，同时通过产业实践反向重塑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二是突破“个体—结构”二元对立视角，将宏观制度环境适应性变革与微观主体能力建构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三、新农人的嵌入进阶：从认知认同到服务乡梓的演化路径

（一）认知性嵌入：从旁观者到共建者的角色重构

认知性嵌入是在外部环境的作用和个体思维活动影响下，个体所表现出的一种与特定的社会背景、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行为。嵌入行为具有动态性，其随着个体认知的变化不断调整。认知的变化，无论是深层次的价值观还是表层的知识结构，都显著影响着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嵌入选择和行动策略。

新农人投身乡村产业的过程，本质是其认知框架发生深刻跃迁，并驱动其角色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向“共建者”重构的过程。这一认知跃迁首先体现在对乡村价值的再发现。新农人突破将乡村简单视为“发展洼地”的传统观念，转而深刻洞察到其在产业升级、多元业态培育与品质消费需求下的巨大潜力，从而将乡村重新定位为能够承载其事业抱负的“价值高地”。与此同时，在职业选择的逻辑上也实现同步升级。其驱动力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经济报酬，而是融合个人志趣、创新创业激情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多重诉

求。正是在这种价值再发现与选择逻辑升级的双重驱动下，新农人完成从疏离性的旁观到深度共建的角色转换，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资源整合能力与战略眼光等核心特质也正是在这一主动嵌入并致力于共建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和强化。

新农人认知的变化使其对村庄新的发展机会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其对新兴市场趋势、政策导向、村庄环境变化等方面信息的了解使其能快速识别并把握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对机会的警觉作为一个重要的感知变量，对普通个体成为企业家（创业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这种警觉性激发新农人的创业精神和动力，促使他们将预期、规划、愿望转变为现实，融入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从而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身份性嵌入：建构本地化认同和身份合法性

新农人凭借认知认同选择乡村作为职业场域后，其与村庄社会建立实质性联结的过程，深受其身份特质与既有社会资本的影响。依据其与村庄的先赋性关联强度，可将其大致区分为“内生型”与“外源型”两类，二者在嵌入过程中面临不同的情境与路径选择。

“外源型”新农人通常由产业人才政策引入。进入村庄初期，对乡村社会来说是陌生人，其与乡村联系的建立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需要经历漫长的重复性博弈才有可能达成合作共识，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博弈失败而退出村庄。此情景下，要想达成合作共识，与村庄实现顺利互动，则可以凭借其“政策身份”，通过村庄有话语权的人比如村干部或村庄其他较有威望的人带入。凭借“政策身份”由有威望的人带入将极大地降低新农人与村庄建立联系的成本损耗，为实质性互动打开通道。相比之下，“内生型”新农人虽拥有本地身份，但因求学、务工等原因阶段性离乡，其“再嵌入”同样需要经历一个调适过程，包括重新熟悉环境、重构生活价值与激活沉寂的社会关系[21]。然而，其“本地身份”作为一种宝贵的先赋性社会资本，提供共享的地方性知识、话语体系与默认规则，使其互动基础的建立更为顺畅，有效降低初期的沟通与信任成本。

“角色包含行为规则或从中导出这些规则的偏好[22]。”“本地身份”和“政策身份”使新农人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新农人能借助潜隐于身份的共享话语或权威性支持获取村庄内部信任。内部信任的建立是新农人嵌入村庄结构的重要机制，其为新农人产业实践提供机会和条件。

（三）策略性嵌入：日常互动中的“熟悉”扩散

策略性嵌入关注新农人与村庄互动的日常性，主要包括情境性互动、人情性互动和事务性互动三种方式。

情境性互动是新农人嵌入村庄的日常性行动之一。新农人通过参与村庄生产、生活、文化性活动，与村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在特定情境下的互动使新村民更好地理解村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从而在具体情境中展现出符合村庄期待的行为。“人情”构成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围绕乡村社会关系展开的人情往来对个体感知、生产、生活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人情社会中先“情”后“礼”再后“理”最后“法”的争端解决机制使乡村能实现“无讼而治”的治理效果[23]。新农人通过逢年过节的礼物赠送、红白喜事的参与、日常生活中的互助等行为，主动维护邻里关系，这使得其在发展过程中能与村庄保持和谐关系，降低新农人与邻里发生矛盾纠纷的可能性，加强与村庄内部的情感联系。情境互动和人情互动指向个体化的人际互动，而事务性互动则更关注新农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及其在村庄事务中的角色。一方面村级组织会将新农人纳入村庄公共事务的讨论，另一方面新农人也会积极主动参与到村庄事务的讨论与解决。对新农人来说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前台化的过程，通过在公共事务讨论中的参与、发言亦或对事务治理的多元形式支持，新农人迅速提升在村庄的存在感的同时，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话语权作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外性后果对新农人争取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策略性互动的过程是一个“熟悉”扩散的过程。新农人通过不同形式的日常互动，在扩大互动范围的同时，也使互动程度不断加深，与村庄

内部成员之间的熟识度不断强化。熟识度的强化有利于降低新农人与村庄内部的沟通成本、缩短对村庄了解的周期、拓宽新农人信息来源并广泛了解村民及村庄的需求，从而选择有效行动策略或对产业实践做出及时调整。

（四）服务性嵌入：从“互动”到“互助”的嵌入深化

嵌入村庄社会网络是新农人获取潜隐性信息，建立信任并顺利展开产业实践的有效途径。通过日常的互动和参与，新农人逐渐熟悉村庄社会文化、交往规则和利益诉求，这种熟悉使得新农人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强化与村民之间的信任，为新农人获取村庄信息、资源，开展创新性实践提供社会基础。但是嵌入并非一个单向的汲取过程[24]，以汲取为单一取向的嵌入忽视其与村庄内部的利益共享和互惠，最终会因为嵌入主体和嵌入环境、嵌入对象之间的利益失衡或脱钩而遭到来自村庄内部的排斥。新农人嵌入的服务取向能防止新型主体与村庄内部的利益失衡与脱钩，服务取向的嵌入意味着新农人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考虑村庄的整体利益，通过向村庄内部成员或村集体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贡献，实现对村庄内部发展的带动，确保其个体化发展与村庄发展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

新农人面向村庄社会的服务性尤其表现在其对村庄剩余劳动力就业需求的满足。现阶段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是由于村庄农业向规模化种植转型，另一方面则是原来进入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随着年龄的增大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在双重因素影响下，农村出现以大龄农民为主的劳动力剩余，解决大龄劳动力再就业是乡村发展中的主要任务。新农人嵌入乡村开展产业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农村剩余大龄劳动力，满足大龄劳动力再就业需求。新农人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往往对知识、技能没有过高的要求，只需简单培训即可正式上岗。除此之外新农人创造的岗位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能使农民兼顾生产生活。

服务取向的嵌入使新农人产业实践逐渐获得村民认可，使其更好地融入乡村社会。其在乡村的产业实践不再是单纯的资源获取过程，而是与村庄互惠互利的合作过程。这种融入为新农人产业实践提供稳定社会环境的同时为其产业实践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四、嵌入式赋能：“新农人”何以赋能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新农人的产业实践并非止步于对村庄既有环境的被动适应，更展现为一种积极的“建构性”行动。这种建构性体现在，新农人并非简单地嵌入预成的产业格局，而是通过其引入的新知识、新资本与新网络，主动参与并重塑乡村产业的形态与边界。前述分析已揭示新农人“嵌入”村庄社会结构与产业网络的具体路径，下文则将深入探讨在这一“嵌入”基础上，新农人是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驱动乡村产业的多元化进程。

（一）供给革新：新农人嵌入下的供给能力提升

消费者的需求是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立和确定的力量，但是单从需求侧，无法对新消费动力的产生以及乡村经济发生新变化进行全面的认识。分析“变化”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25]，这就需要“沿需求侧的结构化认识推进供给侧响应机制的相关分析认识”[2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要举措，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7]。新农人作为乡村创新创业的核心主体，在乡村产业多元化供给能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通过所具有的技术、经验与信息优势促成乡村生产增能、业态形塑和产业调适。

首先，新农人的技术嵌入与生产增能。对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是新农人区别于传统农民的首要优势。新农人将技术运用于生产端，通过工具创新和产品创新提升乡村产业的供给能力。其一，生产工具创新。投身第一产业的新农人往往具有技术能力或具备学习技术的能力，能在短时间掌握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并将之运用到实际生产。“现在什么都得靠技术，技术的更新换代又比较快，就得不断地去学习，既要看哪些技术我们能用，还得去对比哪个用着划算，在这方面年轻人有优势。”（ZJ20240723FWD）新农人参与使得农业生产向机械化、科技化迅速转型，农业生产效率实现提升。其二供给产品创新。新农人通过技术嵌入推动产品供给创新。一方面通过对初级产品进行升级打造，如对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对产品进行文化赋能，使初级产品向商品化、特色

化转变，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新农人会引进新的产品，丰富乡村产品类型的同时促使乡村生产思维发生变化，乡村生产不再受限于传统的产品供给，而是在多元化供给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其次，新农人的经验转化与新业态塑造。“脱嵌”虽然导致新农人社会性“再嵌”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脱嵌”的生计体验却为新农人经济性“再嵌”提供资本。“脱嵌”于村庄的个体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积累行业经验与个人资本。资本和行业经验构成新农人返乡开展创新实践的重要条件。新农人产业实践与其在城市的就业经历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降低新农人创业成本的同时，有利于其规避创业风险。“当初选择餐饮行业就是因为，之前在城市的时候就是做餐饮的，现在做这个比较容易上手。”（ZJ20240720CLX）除了个体化选择之外，村庄在引进产业人才时也会将从业经验作为参考。“在引进产业型人才的时候，会有意地引进一些有不同行业经验的人。他们能将新的业态带到村庄，加速村庄新业态发展。”（SC20240425JG）新农人在城市的生计经验并非与乡村断裂，相反，其耦合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需求，为乡村多元产业形态的出现创造条件。

最后，新农人的信息捕获与产业调适。产业调适是指在产业决策过程中，通过不断引入新的产业信息、市场信息、政策信息以降低产业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产业风险，增强产业创新实践的发展韧性。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在产业调试中的角色受到广泛关注，而新农人的调试角色往往被忽视。实际上新农人作为乡村产业的第一实践者，在产业实践中具有主动性，他们能及时捕捉到市场信息，并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策略。有主体性地自我调适，使新农人的产业实践具有适应性，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二）市场延伸：新农人嵌入下的市场环境变迁

乡村市场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载体，其发育和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效果。传统乡村市场受制于地理、交通、信息等因素，市场空间、容量、供给、需求有限，是一个边界有限的市场，往往只能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而难以实现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多元发展。新农人的出现为乡村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使乡村市场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对封闭有限的乡村市场环境开始向更加开放、多元、高效转变。

一是市场营利逻辑代替生存逻辑加速乡村产业市场发育。在乡村产业多元化的进程中，新农人群体展现出区别于传统生产惯性的独特角色。这种差异性并非本质性的对立，而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因资源禀赋、知识结构与市场阅历的不同而呈现出的行为模式分化。传统农户的生产决策通常深度嵌入本地的社会网络与经验传承之中，其经济活动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而新农人则更多地将外部市场的知识、技术与商业模式“嵌入”乡村，其核心作用体现在对乡村产业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塑造上。新农人能够凭借其更广泛的市场联结与品牌意识，主动推动本地产品从“土特产”向“商品”再向村庄乃至地方“品牌”的跃升，通过标准化、故事化和体验化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附加值。尤为关键的是，新农人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冒险精神与长期投资意愿，勇于尝试新业态并承担前期风险，其战略着眼点不在于短期收成，而在于产业生态的培育与长期资产的价值，从而为乡村引入新的发展范式，激活产业多元化的潜在路径。P村农业综合体经营人说：“要想做大农村市场，就得吸引人，所以我们现在一些项目，比如这种油菜花节，看似收益有限，但吸引了上万游客，这些人来村里的消费需求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做的是长期的规划。”（SC20240506LYM）新农人的市场营利逻辑加速乡村产业市场发育，使乡村产业市场朝着商品化、品牌化发展。

二是外部关系连接内部关系促使乡村“巢状市场”发展。“巢状市场”被视为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产生直接连接的“另一种市场”[30]。新农人嵌入乡村社会并不是个体性的嵌入，而是连带其社会网络一同嵌入，即其在村庄以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联动。新农人作为村庄和外部社会的联结点，可以带动或促使城市消费者直接与农户对接。以“卖面子”的人情为基础促成的交易增加农民交易机会的同时节省农民的交易成本。除此之外，新农人本身也可以作为消费端，直接对接小农

户，小农户和新农人之间形成直接的供应消费关系，既降低小农户成本，也降低新农人经营成本，使其和小农户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稳定市场关系。

三是数字化平台嵌入传统市场延伸乡村产业市场空间。施坚雅将中国农村市场按照规模和功能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基层市场基本满足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31]，因此农民的市场行为大多限于基层市场半径之内，且有明显的周期性，限制乡村产业规模化发展和乡村产业竞争力提升[32]。新农人的嵌入使乡村交易不再限于基层市场，而是通过直播、互联网销售平台等新型交易方式，打破传统市场限制，使乡村交易半径得以拓展，将乡村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延伸乡村产业市场空间。P村党支部书记说：“这些新农人来了之后，他们比较懂技术，能玩转现在的新媒体平台，往往会通过抖音、快手等拍一些视频、段子等吸引流量，能帮忙为村庄做宣传，特别是他们能借助新媒体平台把农副产品销售出去，不光自己买，还会帮村民一起买。”（SC202404025JG）

（三）资源重组：新农人嵌入下的资源环境优化

“资源诅咒”限制乡村产业健康发展进程，亟需从产业经济系统内部进行资源重组，以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潜力。这一过程中，新农人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在闲置资源优化配置、资本资源整合以及人力资源优化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重组力。

一是闲置资源的激活与重组。新农人产业实践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强度。然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构成约束性条件，这就需要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优化以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新农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驱动一方面体现在新农人对乡村闲置资源的再利用。新农人的嵌入在激活对闲置资源需求的同时促使村庄进行制度改革，以满足产业发展的新需求。这种制度改革实质上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物质基础。例如四川D市P村，返乡青年和跨界创业者在政策吸引下进入村庄，激活对村庄闲置房屋和闲置土地再利用的需求，早期对闲置资源的使用都是一种私下交易的方式，私下交易引发不合规的土地及农村宅基地买卖情况的发生，并引发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为了规范闲置资源使用，防止不规范行为发生，当地在学习其他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最终形成“四书止纷”的创新性工作方法。通过多部门多主体参与，在村庄搭建交易平台，激活村小组的协商议事功能，在确保各主体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也为村庄闲置资源的规范使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新农人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对乡村土地资源进行重组。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原本分散的土地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推动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

二是资本资源的整合与再生。资本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回流资本作为村庄资本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村庄产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早期乡村资本回流多被用于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33]，回流资本无法实现再生产。然而，随着乡村产业发展阶段的到来，新农人成为资本回流的新主体。新农人引领的资本回流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逻辑。新农人主导的资本回流发生在适度社会竞争的环境中[34]，他们更加注重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和长期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回流资本大多被用于产业投资。以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回流不仅为个体带来经济效益，也促使资本资源向产业效益转化。

三是人力资源的吸引与释能。新农人的创业实践产生一定的正外部性效应。一方面，新农人的回乡实践重构村庄舆论环境。以往，年轻人“留乡”存在污名化现象。然而，随着新农人返乡，污名现象发生转变。新农人通过实践证明个体价值，使留乡不再是不体面的事。相反，返乡创业成了能力的象征。舆论环境的改变，为新农人返乡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前年轻人留在村里是要被笑话的。现在不一样，刚开始可能别人会说，但是到后面别人都看你发展好了，而且还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大家都觉得有本事。”（ZJ20240709CML）另一方面，新农人的成功产业实践发挥着示范带动作用。新农人的积极实践不仅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对乡村产业模式的积极探索。其开创性实践吸引更多新型主体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促使乡村产业实践实现人力资

源持续优化的同时形成人才聚集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组织再造：新农人嵌入下的组织功能变革

组织变革是实现产业现代化的关键。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产业主体高度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从而限制乡村产业发展。因此，实现组织再造成为乡村现代化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组织再造是相关主体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摒弃惯例性运作模式和工作方法，对产业经营、管理进行重新设计的战略调整过程[35]。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新农人作为组织再造的核心力量，通过主体联动和功能定位驱动产业进程中的组织变革，从而为乡村产业发展构筑起内部秩序并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一是主体联动催生新型组织形态。产业主体的孤立引致村庄产业发展无序，特别是乡村多元产业开始出现之后，孤立化的经营不仅无法形成发展合力，甚至由于内部的恶性竞争，破坏村庄发展环境。通过主动或被动实现的主体间联动，有利于加强产业主体互动，使分散的产业主体走向联合，进而嵌入某一跨区域产业组织或者催生本地新型产业组织形态。以浙江省B村民宿经营主体为例，民宿经营主体在村组织的引导下建立“民宿协会”。“当时成立这个协会主要就是为了方便统一协调，大家能相互合作。村上牵头成立，村里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都同意进行统一管理，后面有事也能一起商量。”（ZJ20240725CML）新组织形态的出现打破了村庄产业主体松散经营状态，使其走向组织化发展。基于高频度互动的信任得以生产，产业主体间合作成本降低，合作空间拓展。

二是新农人以功能定位重塑社会组织价值。社会组织的转型升级以社会组织价值塑造为前提。随着社会组织日益成熟，组织功能逐渐由单一向多元扩散。在产业发展中，社会组织不仅承担着维护内部秩序的基本职能，也通过资源整合、资源分享、技术互动等机制，有效地促进乡村产业的综合发展。在资源整合与分配方面，除了个体性资源外，团体性资源则由产业组织统一与外部市场对接，再根据客户需求和主体条件以及服务内容对资源进行统一分配。B村民宿产业实践中，由协会会长统一对接外部调研、考察、旅游等资源，之后会长根据团队餐饮、住宿要求，结合村庄各民宿经营主体民宿服务内容和布局对团队资源进行分配。社会组织的统一对接与分配，提升整体供给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同时也适配于村庄产业市场状况。村庄的产业市场相对较小，资源有限，统一管理，有利于产业主体实现利益共享，促使产业共同体形成。在技术互动方面，组织为新农人之间以及新农人与村民之间提供技术互动平台。通过信息的交换、技术交流等不同形式互动，不同产业主体的管理、生产能力得到提升，防范因信息、技术能力不足而带来的产业风险。

质言之，在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新农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适应和融入乡村产业，更在其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新农人的产业实践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一方面，其实践活动破坏或淘汰传统的生产和销售结构；另一方面，则又引发乡村产业环境的深刻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新型产业主体通过供给革新、市场延伸、资源重组和组织再造，将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乡村产业体系。这些创新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环境的系列革新，并在新农人创新实践优化过程中迅速适应着“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变化，因此以新农人为核心的创新活动成为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五、结论与讨论

进入新时代，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乡村整体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国家的乡村政策日益完善，乡村发展机遇不断增加。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以多种形式投身乡村生产经营活动，成为村庄中的“新农人”。本研究运用“嵌入—赋能”理论框架，对“新农人”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新农人产业实践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新农人通过认知、身份、策略与服务性嵌入，深度融入乡村，为其产业实践奠定社会性基础。第二，新农人并非单纯地嵌入与适应乡村产业实践，其更为关键的价值在于通过供给革新、市场链接、资源重组和组织再造，对乡村产业实

践进行重构，驱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第三，新农人的产业实践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经济逐渐摆脱静态“循环流动”，走上一个不断适应外部变化的动态发展轨道。

不同于以往研究关注政府或村级组织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本研究以处于产业实践一线的新农人为研究对象，考察新农人创新实践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以新农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机制，既丰富了产业研究视角，又使研究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性。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农人嵌入乡村社会的动力机制不同，本研究在关注新农人嵌入性的同时，尤为关注新农人在乡村产业实践中的建构性角色。宏观与微观提供两个不同的视角，而通过对新农人嵌入过程的考察和创新实践的分析能使我们看到微观与宏观相互嵌合的过程，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实现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

以新农人为主体开展产业创新性实践是目前乡村经济转型的一种探索性实践，通过改善乡村环境、制定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新农人参与乡村经济发展，通过开展创新性产业实践如产品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和组织创新，打破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路径无疑是对传统乡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变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以新农人为主体的经济变革，也存在一定的变革成本和变革风险。一是新农人在争取产业资源过程中可能会和传统村民之间形成竞争，而相比于有专业知识、市场经验与资本积累的新农人，传统村民在村庄资源竞争中相对劣势，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的获利空间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二是新农人在发展中是以盈利为导向的，市场盈利逻辑下的经济行为不一定就是符合村庄发展需求特别是村庄社会需求的经济行为。三是进入村庄后的新农人构成村庄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逐渐演变为村庄治理中的“中坚力量”，村庄传统农民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村庄发展的话语权逐渐向村庄政治精英和村庄经济精英倾斜，农民和村庄精英之间存在矛盾激化风险。故此，以新农人为核心的产业创新实践只是一种初步的变革。乡村经济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乡村社会发展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课题组，张红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新农人发展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16（4）：2-11.

[2] 梁栋，吴存玉. 乡村振兴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现实基础、内在逻辑及其省思[J]. 现代经济探讨，2019（5）：125-132.

[3] 王丹，吴杨. “新村民”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青山村的个案考察[J]. 重庆社会科学，2024（6）：43-55.

[4] 毛一敬.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1）：122-130.

[5] 闵兢，黄慧. 返乡青年治村的实践逻辑与空间再生产[J]. 中国青年研究，2024（8）：50-59.

[6] 王维，向德平. 从“脱嵌”到“再嵌”：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研究——基于多个青年返乡发展案例[J]. 兰州学刊，2023（12）：101-112.

[7] 孙小梅，喻君瑶，朱亚鹏. 分类赋能—选择吸纳：乡村新型治理主体的重嵌与激活机制——基于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双案例研究[J]. 行政论坛，2024，31（3）：105-114.

[8] 班涛. 能动的嵌入性：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与功能定位[J]. 社会科学，2023（5）：160-170.

[9] 李耀锋. 何以携手共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下农户回应的机制研究[J]. 社会发展研究，2024，11（2）：169-187，245.

[10] 赵雪，石宝峰，盖庆恩，等. 以融合促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J]. 管理世界，2023，39（6）：86-100.

[11] 李博. 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及其推进路径——基于不同人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J]. 云南社会科学，2020（4）：137-143.

[12] 傅琳琳，黄祖辉，朋文欢. 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与推进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69-77.

[13] Wigren-KristofersonCaroline，BrundinEthel，HellerstedtKarin，et al. Rethinking embeddedness：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2022（34）：1-2，32-56.

[14] 侯仕军. 社会嵌入概念与结构的整合性解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11（2）：86-94.

[15] Jack S L，Anderson A R. The effects of embeddednes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2，17（5）：467-487.

[16] Meister A D，Mauer R. Understanding refugee entre-

preneurship incubation-an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19, 25 (5): 1065-1092.
[17]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3): 481-510.
[18] 黄中伟，王宇露. 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 (12)：1-8.
[19] 兰建平，苗文斌. 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 技术经济，2009，28 (1)：104-108.
[20] Arenius P, Minniti M. Perceptual variables and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 233-247.
[21] 张艳斌. 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及主体性建构：基于个体化的视角[J]. 兰州学刊，2022 (8)：125-134.
[22] Montgomery J D. Toward a role-theoretic conception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104 (1): 92-125.
[23] 郁建兴，任杰.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 学术月刊，2018，50 (12)：64-74.
[24] Jack S L, Anderson A R. The effects of embeddednes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2, 17 (5): 467-487.
[25]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2-73.
[26] 贾康，苏京春. 论供给侧改革[J]. 管理世界，2016 (3)：1-24.
[27] 贾康.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解放生产力[J]. 中国经济周刊，2015 (49)：78-79.
[28] 许源源，康儿丽.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J]. 公共管理学报，2023，20 (4)：121-133，174.
[29] 张新文，杜永康.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2)：23-33.
[30] 叶敬忠，贺聪志. 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2019 (2)：137-158，207.
[31]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6.
[32] 刘守英，郑旭媛，刘承芳.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交易和产业转型[J]. 中国农村经济，2024 (6)：2-24.
[33] 夏柱智. 小农体系、渐进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 (2)：1-11，111.
[34] 彭晓旭，张慧慧. 产社一体：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及其效应——基于马村鞋垫产业的考察[J]. 农村经济，2022 (5)：107-115.
[35] 张晓飞. 从组织再造看组织模式的变迁[J]. 管理现代化，2003 (1)：40-42，61.

Embedding empowering: the embedding path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new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Yan Qihang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farmers"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capital renewal and rural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tourism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Sichuan and Zhejia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mbedding-empowering"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new farmers driv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t is found that new farmers realize the role change from external participants to endogenous builders through the path of "cognitive embedding-identity embedding-strategic embedding-service-oriented embedding", which trigger the structural response of the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 on the one hand,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the industry is activated through supply enhancement, market expansion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refor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ology is reconstructed, and finally a new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xogenous empowerment"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s form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nd systemic change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ha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alent policy innov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 farmers; Advanced embedding; Structural empowerment